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3.4

5 issues a year in 15 languages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从政生涯

社会学志业

Chizuko Ueno,
Vladimir Yadov

保加利亚的今与昔

Mariya Ivancheva,
Martin Petrov,
Georgi Medarov

马来西亚社会科学

Shamsul A.B.,
Rahman Embong

- > 到贫民窟观光
- > 孟加拉国成衣工厂倒塌的背后
- > 你的论文被外包了
- > 突尼西亚社会学
- > 影像社会学
- > 给ISA会员的折扣书籍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4期 / 2013/8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编的话

新社会学

集 体愤怒目前在全世界仍然继续创造着历史，并且把这个火炬从 Gezi Park 和 Taksim Square 传到巴西和埃及，并且不断创新。Tahrir Square 的群众虽然难以预测结果，但是他们坚定拒绝被政治收编。这些文化上相似，但是政治上却独立的运动席卷全球，为社会运动理论带来挑战，也催生着新的社会学的诞生。

新社会学必须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复杂牵扯议题。这期全球对话讨论了资本主义的第三波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化。Mallika Shakya 分析了孟加拉国成衣工业悲剧的全球结构性原因；Bianca Freire-Medeiro 描述巴西贫民窟的新兴观光产业；Jeff Sallaz 则解释出版工业外包，并把我们的论文卖回给图书馆，藉此赚取巨额利润。此外，关于个人的生命史，Rahman Embong 则告诉我们社会学在马来西亚已经被边缘化，因为大学需要会赚钱、在政治上不找麻烦的科系。

我们要到哪里找这个新的社会学呢？我们至今已经介绍了许多东欧后共产的社会学面貌，包括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东德。这期有 3 位保加利亚的社会学家挑战辩论里的概念。Martin Petrov 描述了 Sofia 街道上的故事如何和共产主义交织而成。Georgi Medarov 回顾了前共产主义的复杂政治图像，以及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Mariya Ivancheva 则批判反省了委内瑞拉社会主义与东欧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这些文章都企图藉由过去替未来找寻出路。

新的社会学需要新的方法才能够解答复杂的历史与社会谜题。我想，Jordanna Matlon 访谈 University of Evry 的 Joyce Sebag 和 Jean-Pierre Durand 是个再好不过的开端了。借着这个影像社会学得专题，我也在此跟各位邀稿（高分辨率照片和 300 字以内的描述），全球对话的影像社会学专栏诚挚欢迎来稿！

全球对话以 15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巴西两届总统 (1995-2003)，ISA 会长 (1982-86)，社会学家，正在谈论身兼社会学家和总统的利与弊。



Chizuko Ueno，著名的日本公共知识分子，社运者，社会学家，正回顾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的经验。



Vladimir Yadov，苏维埃时期的社会学先驱，于 Putin 时代致力保护社会学自主性。前 ISA 副会长。他受到许多学生爱戴。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Celia Arriba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Hamidreza Rafatnejad, Tara Asgari Laleh,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Faezeh Khajezadeh.
日本:
Kazuh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Takako Sato,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Yutaka Maeda, Shuhei Naka.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Kamil Lipiński, Natalia Jońca.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Monica Alexandru, Telegdy Balasz, Marian Mihai Bogdan,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Alexandra Duşu, Cătălina Gulie, Angelica Helena Marinescu, Monica Nădrag, Lucian Rotariu, Cosima Rughiniş, Alina Stan, Mara St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Eleonora Burtse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Julia Martinavichene, Ekaterina Moskale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乌克兰: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Anastasia Denisenko, Mariy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tsova, Lidia Kuzemska, Anastasiya Lipinska, Myroslava Romanchu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bigail Andrews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Celia Arriba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Hamidreza Rafatnejad, Tara Asgari Laleh,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Faezeh Khajezadeh.

日本:

Kazuh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Takako Sato,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Yutaka Maeda, Shuhei Naka.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Kamil Lipiński, Natalia Jońca.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Monica Alexandru, Telegdy Balasz, Marian Mihai Bogdan,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Alexandra Duşu, Cătălina Gulie, Angelica Helena Marinescu, Monica Nădrag, Lucian Rotariu, Cosima Rughiniş, Alina Stan, Mara St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Eleonora Burtse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Julia Martinavichene, Ekaterina Moskale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乌克兰: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Anastasia Denisenko, Mariy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tsova, Lidia Kuzemska, Anastasiya Lipinska, Myroslava Romanchu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新社会学 2

社会学家作为总统

访谈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巴西 4

社会学作为志业: 成为日本的女性主义者

by Chizuko Ueno, University of Tokyo, 日本 7

社会学作为志业: 社会学家的天命

by Vladimir Yadov, 俄罗斯 9

> 贫穷

贫民窟观光

by Bianca Freire-Medeiros, 巴西 11

孟加拉国成衣工厂倒塌的背后

by Mallika Shakya, 印度 14

你的论文被外包了

by Jeffrey J. Sallaz, 美国 17

给ISA会员的折扣书籍

by Sujata Patel, 20

> 保加利亚

两种社会主义

by Mariya Ivancheva, 匈牙利 22

Sofia街道上的故事

by Martin Petrov, 保加利亚 24

后共产保加利亚的大屠杀辩论

by Georgi Medarov, Sofia University, 保加利亚 26

>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社会科学

by Shamsul A.B., 马来西亚 28

一个社会学家的回顾

访谈Dato Rahman Embong, 马来西亚 30

> 社会学Live

突尼西亚社会学

by Mounir Saidani, 突尼西亚 34

影像社会学

访谈Joyce Sebag and Jean-Pierre Durand, 法国 36



> 社会学家 总统

访谈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巴西两届总统 (1995–2003), ISA 会长 (1982–86), 社会学家, 这篇访谈是 Cardoso (以下简称卡) 于 2004 年, 也是他卸任总统后的一年, 于美国社会学年会发表的闭幕演讲。

布: Cardoso 总统, 社会学如何影响了你的总统生涯? 特别一提的是, 你还是一位大国的总统。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卡: 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 或是学术生涯也一样, 我想那就是我信仰着某个理念。若你没有理念, 没有立场, 而又想做些什么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有个信仰。我知道这种说法和一般的政治人定义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想我和你一样, 读过韦伯。而韦伯区分出心智伦理与责任伦理。但是他从未把两着独立开来为政治行动赋予意义。相反地, 他同时考虑这两者。韦伯本身就是个德国民族主义者, 他有他自己的坚持与价值。

若你有理念, 而且也有能力适时适当地表达出来的话, 那么, 你可以成为政治领袖。没有这项能力是不可能涉入政治的。你可能被选上, 但是缺乏理念的政治人物很难成为政治领袖。以我为例, 我这个世代最可以召唤我们热情的, 并不是追求经济发展, 而是民主。民主是我的理念。

当时当我直接射入政治时, 那还是个威权的年代。人民的自由被剥夺了。你会看到人民被驱逐, 被送入监牢, 甚至被刑求。改变这一

切遂成为了我们这个世代的主要诉求。这就是我们对民主的渴望, 对民主的理念。

布: 民主是一个模糊且被滥用的字眼, 你所谓的民主为何?

卡: 民主当然有很多种形式, 但这都是同一价值的不同表现与不同组成。当今世界上的民主不只是政党与选举而已。我必须说, 在某个意义上, 我从不属于特定的政党, 从不是一个党派分子。我不喜欢做一个党派分子。当我在地一次竞选参议员时, 我对着我政党的人说, 我讨厌政治好战份子。

我也不认为政治和政党是相等的。当今世上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广泛接触社会的能力, 并且可以清楚的跟各种不同的人阐释自己的政治理念。

所以成为一位成功的政治人, 必须有能力去召唤、沟通、以及触动人民的情绪。某个程度上你必须像是个演员。往好的方面来说, 成

>>



为演员并非是你真的在演一出戏。这不是我所谓演员的意思。我是说你必须有能力去感受情绪，去传达情绪。我可以投身政治或许就是因为我喜欢人民吧。作为总统，我试着去和百姓感同身受。总统向来是和民众有很大距离的。可是总统身边也有侍者啊，也总是有民众关心着总统啊，甚至在游泳的时候都有很多人想接近你。而且我们有司机，有保镖，这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普通百姓。所以我试着去和这些人聊天，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和我闲话家常的，不用老是把我当总统看啊。而且我也试着去倾听他们的感受。所以身为演员并不是说去当一个表演者，而是去藉由传达情绪影响公共事物，展现你对理念与核心价值的真诚信仰。这也是身为一个人的意义所在。

布：社会学有帮助你成为一位真诚的人吗？

卡：社会学帮助很大！在巴西和我竞争的人——我的对手——总是说“瞧！这个人从来没有穷过，法文比葡萄牙文说得还溜呢。”他们喜欢说这类的话来贬低我，但可惜他们没抓到重点。我在国外当教授的经验教导了我一件事：我说话必须了当直接，不能像知识分子。

我记得当我被军政府驱逐出境时，我开始在智利教书。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很像，但终究不同。巴西人可以了解西班牙文，但是讲西班牙语的人却不行了解葡萄牙文。智利那里抗议我每说的任何一个葡萄牙字，所以我必须简洁。

还有身为社会学家，很重要的是一而我们也这么被训练——和人们互动。当反对者说“这

个人不懂贫穷家庭”时，我总是一笑置之，因为我社会学的第一个研究就是和黑人住在一起，研究种族关系的。所以我拜访了许多的南巴西贫民窟。我后来研究工人，然后是企业家。我的社会学生涯就是从研究弱势族群开始的，怎么会不懂贫穷是什么呢？

我也修过很多人类学的课。事实上我们当时是一起学这三门科目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而且你知道人类学家看很细节的事物——我太太就是人类学家。所以他们喜欢和人们说话，作笔记，对小改变很有感受。对政治人物来说，这种了解他人与沟通的能力是相当重要的。这让你可以影响他人，也可以成为一位演员。如同我之前强调的，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达你真实的情感。

布：社会学也可以是拐杖？

卡：是的。的确，我记得我第一次竞选时我其实很害羞。但是竞选就是要接触群众。他们会拉着你不放。我记得第一天竞选活动结束后我累瘫了，热情简直被耗尽了。竞选其实是一场肉搏战，人对人的肉搏战。这不是演讲，而必须真实碰触人民。你必须越靠近越好。这是需要训练的。所以一开始对我来说并不轻松。

但是，讲话也很重要没错。对学术人来说，对群众演说并非易事。你必须简单且肯定。不要想说讲很伟大的演讲，因为人民不喜欢。这对教授来说很不容易啊。我记得在一开始我努力试着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给不同的演讲，因为一天下来其实有8到10个场次，每场都讲一样的东西让我觉得很丢脸。所以我要针对不同

群众给不同的演讲，这可让我忙翻了。

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你想说的，所以你必须一再重复同样的事情。你必须简化且不断重复。在那样的场合，要当一个社会学家或者是政治人物，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一旦到了电视上，我们就很有利了。我第一次竞选 São Paulo 的参议员时，那时还是军政府统治，我参加电视辩论，对手是执政者。我在辩论中相当冷静，因为我当老师很久了，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当我回家后我的朋友却很失望。他们说，你看起来没有热情，没有情绪。可是对观众来说，影响却是正面的，因为电视需要的是对话，比起公开演讲需要更深入的对话，所以我占了优势。这个优势是从我当社会学家和老师中得来的。对我们来说上电视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表现得像一位好老师，清楚传达理念，对我们来说相对容易。

布：你怎么处理政党议题？

卡：像我说的，在巴西，重要的是领导者可以把愿景呈现给全国人民，而不是对政党负责。领袖必须说服多数的人相信你，甚至有时要绕过政党。

政党很多时候更有可能是保守而非进步的。政党并没有准备好去创新，所以你必须绕过这个结构。同时你也必须去了解没有政党结构，你也很难成功。所以你不和政党对抗。如果你直接和政治系统起冲突，那么就会变成有可能成为独裁者或是被弹劾。

你可以操纵群众并且动员他们对抗国会。利用电视也不难。但是这条路是独裁者的方式。我们必须用民主的方式，并且不让人民对抗国会，因为国会有可能是改革的阻碍。所以你要准备好和国会一直协商，这里社会学的训练就派上很大的用场了，因为你有能力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核心利益所在，这不只是针对政党，还包括了其他群体、组织以及个人。另外，把公众利益放在心里是很重要的。

布：你也面临过全国危机，那你对于当时的危机响应方式怎么解释？

卡：你要总是保持冷静，特别在危机时刻。例如，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时，你的政府和你自己有可能都会被淹没。此时，有分析的能力去看到更大的图像可以帮助你保持冷静。你必须在不同的层次行动，有时亲近人民，有时保持距离，所以不会让整艘船摇晃，反而可以提供航海地图，并且掌舵，带领大家航行。

在这些时刻中，总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保卫国家长远的利益，不让国家瓦解。国家崩解需要很长的时间重建，也要付出很大的社会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当风向对时，要会乘风破浪，抓住机会往前进。这会让你变得更强壮，在坏的时机可以保住整个体系不会瓦解。

在什么程度上这和社会学训练有关？我会说很大的程度有关。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和能力。不过，基本上我认为社会学的训练给了我们更宽广的视野，给我们更好的能力去参与这个不同群体互动的游戏之中，也让我们知道没有单一的方式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布：最后谈谈你对于政治的社会学看法？

卡：政治，由其是民主政治，需要永恒不断地沟通。回到鲁索的普遍意志，我会说普遍意志每天都不一样。所以政治人物必须容许这个变化，让更多的人可以进来讨论政治。人民不再满足投票而已。正当性不只来自于投票。现在需要的是对于核心理念的不断确定。

我好几次获得了数百万得票，且两次的总统得票率都过半，但这些都不够，你还是必须每天建立正当性。这几乎就像是每天都是新的一天。若有人说他可以从此永久获得人民的信赖的话，肯定是骗人的。你必须不断更新人民对自己的信任程度，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核心价值。

所以我最后的建议是：搞政治很难！别轻言进入！



> 社会学志业

成为女性主义者

by Chizuko Ueno, University of Tokyo, 日本



Chizuko Ueno.

Chizuko Ueno 是日本有名的社会学家，女性主义者，公共知识分子。她带领日本的女性研究蓬勃发展，并且是许多书的作者，包括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Modern Family* (1994, English translation 2004), *Nationalism and Gender* (1989, English translation 2009), *The Erotic Apparatus* (1989),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2002), *A Thought for Survival* (2009), *Misogyny in Japan* (2010), *Sociology of Care* (2011)。她也是女性主义运动者，是社运组织的领袖：Women's Action Network (<http://wan.or.jp/>)。可以看她地演讲：“日本女性主义者 40 年的经验” (<http://worldwide-wan.blogspot.jp/>)。其中她描述了在成功与失败中的平衡点。

社会学家是我自我认同的方便标签。以社会学之名，我可以思考任何我日常生活的题材作为研究课题，从看漫画到和在巴士上与人攀谈，都是范围之内。作为社会学家，我有很深的怀疑主义，对社会尤其如此。我已经不太知道是社会学让我变得如此怀疑主义，或是怀疑主义的性格让我喜欢社会学。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社会学可以让我看到什么错了，什么很愚蠢，什么很奇怪。这种能力让我在性别研究中如鱼得水，因为被性别化的女性是充满错误、愚笨、古怪、不理性的。还记得我年轻时有句话这么说：“今天的谬论会成为明天的常识！”许多方面看来这句话说得还针对，至少在性别领域可是千真万确。

>>

大概 40 年前，当我还是大学生时，那时是 1970 年代，学术界还是男人的天下。男人和女人一起会出现在学生运动中，可是对女性来说那经验却是很糟糕失望的。学生运动完全是男人的游戏，女性没玩的份。男子气概在我看来既充满性别偏见又保守反动。

在学生运动结束之后，我到研究所念社会学。可是，这只是一个休息站，并没有任何的学术期望。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女性研究，刚刚从美国引介而来。那是一个大开眼界的经验，我透过自修学到了非常非常多。我甚至质问我自己我是谁，而“作为女人”是最核心的问题。我很幸运我有历经过那样的思考。

我被认为是日本女性研究的先驱，因为还真的是前无古人。我们这一个世代的女性研究都是自学而来的。我们组成读书会，相互学习，出版杂志，然后推广。我作为社会学者，其实对于既有的社会学感到很无聊，所以我开始投入性别研究，因为我可以很专心致力于此，而且不会受到情绪的打扰。

女性研究在日本是诞生于学院之外的。一开始我们并不期待可以得到教师职位、研究资金、发表期刊等，所以我们一切从零开始。女性研究那时不被看成是严谨的学科。但是短短 10 年内，在 80 年代，许多学术期刊开始引用我们的文章。所以，20 年后，也就是 90 年代，我在 University of Tokyo 有了一个性别研究的教职。那可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学校。在我课堂上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研究题目，像是女性漫画、同志、单亲妈妈的论述结构，以及自慰的历史等。这些主题之中，他们可以自由撰写学士、硕士、或博士论文。不过我也必须说这不保证日后一定可以找得到教职。

社会学帮助我发展出了女性研究的领域。从 Gayatri Spivak 的后殖民写作中，她说“用敌人的武器去作战”。我写的书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1990) 中指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有些东西错了。我其中一位读者说：“读了之后，我开始了解我太太的抱怨了。”是的，他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倾听老婆的声音。但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各自的问题，我们除了使用霸权语言之外别无他法。这和后殖民情境类似，学者用英文在学术界中生存，全球化也代表着英语化。所以，我开始使用两种语言，同

时用英文和日文。这像是男性和女性的语言一样，也像是学术与常民的语言，更像是官话与方言的对比。社会学就是在两者之间徘徊，Karl Manheim 所谓的边缘人理论，不无道理。

女性的研究在功能上和女性主义的行动是相等的。在女性研究制度化之后，许多问题都得以展开，例如：我们都对研究结果负责吗？女性研究有改变了男性中心主义吗？或是女性研究调整了自己以利于制度化？这些问题和女性从军的问题很像，像是女性改变的军队，或是女性从军后被军队同化了？谁先，谁后呢？可惜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后者先，是制度吸收了异议者。.

我们然仍跟许多基本的科学原则奋战中，像是客观性、中立性、可检证性、可否证性等。我们若没有了价值判断，是要如何才能找到好的研究题材？没有价值，我们怎么判断是非？没有希望，我们要怎么撑过研究的煎熬以及很少的回报？

现在我已退休教授了。我不得不说，我实在很高兴我是一位社会学家。社会学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 社会学志业

社会学家的天命

by Vladimir Yadov, Institute of Soci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前ISA副会长(1990-1994)



Vladimir Yadov.

Vladimir Yadov 是苏联的社会学先驱。苏联把社会学看成是布尔乔亚的学科。在 Leningrad University 任教时的 Yadov 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出版了 *Man and His Work* 以及许多方法论的书。他也致力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行为的自律等领域，也被选为实验社会心理学欧洲学会的会长。在后苏维埃时代，他成为了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的社会学主任，发展多元典范的社会学。多年下来俨然是国际上苏联社会学的代言人，在 1990 和 1994 年是 ISA 的副会长。他同时也是苏联自由派社会学家，和新保守主义对学派对抗。他也很受到学生的欢迎，桃李满天下。

我成为社会学家的经过要回溯到 1960 年代，而现在是个好的时机作个总回顾，看看我这场社会学的旅程走得如何。我其实很幸运成为一位社会学家。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政府把社会学视为是布尔乔亚的学科。可是，在斯大林政权之后，整个学术的气氛就比较自由一些。我的同事和我一

>>

起着手在 Leningrad 大学设立社会学研究室。同时，Study of New Forms of Labor and Leisure 也在苏联 Academy of Sciences 下的哲学院成立。这就像是一波社会学运动。不过，这些先行者的教育背景不一样，而且多数是自修而来，自己找英文书来读。

和波兰的社会学家沟通之后，因为波兰的社会学有更好的基础，即使在铁幕之下也是如此，于是苏联和波兰与东欧的学者开启了许多合作研究计划。我很幸运地和 Jan Szczepański 有着密切的联络，而 Zygmunt Bauman 教我理论，以及 Stefan Nowak 花了很多时间跟我解释田野方法。我现在是 University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人文与社会学院的院长，继续和 University of Warsaw 的社会系有密切合作。Krzysztof Kosela 从 Stefan Nowak 那边得到了真传。我想这个传统会一代接着一代，传递下去。

在 1958 年苏维埃政权核准设立了苏维埃社会学会，但是还是在意识型态的控制之下。其内部的章程说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而且政府规定会员在国际场合要宣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过年轻的社会学者在国际的场合和许多其他的国家学者建立了有好的关系。

社会学在俄罗斯现在是个普及的大学学科。可是很不幸的，社会学家好像并

没有专业的认同。社会学的社群被分为许多小团体。其中一个后是苏维埃的文化创伤。如同 Piotr Sztompka 所说的，这是苏维埃社会的分化结果。Viktor Vakhshayn 的文章有这个现象最好的解释。¹

社会的疾病—腐败、族群冲突等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研究课题。可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即使是学术的计划中，俄罗斯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程度仍然低于苏维埃时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优秀的学生愿意担任学术教学的低薪工作。所以，从公共的角度来看，社会学专业已经和民调划上等号，许多人认为社会学家和记者一样，特别还是记者之中有些人还会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去操弄数据结果。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社会学家的公民责任并不亚与其专业知识与经验的要求。当我和学生沟通时，我总是抱着乐观的态度。虽然很少人选择这像专业作为职业，但是我还是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新一代将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把社会学发扬光大！■

1. V. Vakhshayn, “令人失望的后苏维埃社会学” (Global Dialogue 2.3) ; Zh. Toschenko and N. Romanovsky, “俄罗斯社会学的真实面貌” (Global Dialogue 2.5) ; V. Vakhshayn, “We have it all. But do we have anything?” (Global Express 8.20.2012)。

> 贫民窟观光 正夯!

by Bianca Freire-Medeiros, 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in Rio de Janeiro, 巴西



艺术家 J. Koolhaas 和 D. Urhahn 眼中的 Santa Marta。这个贫民窟的重设计由居民合力完成，代表了美学介入引导了观光客的目光。
Bianca Freire-Medeiros 摄影。

在 Rio de Janeiro、Cape Town、Soweto、Mumbai、Manila、Jakarta、Cairo、Nairobi 等地，从 1990 年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化和媒体文化，这些全球南方的大城都可见这些观光商品，并且被

推销者和消费者大力支持着。

Rio de Janeiro 有 20% 的人口是贫民，换算成数量是一百三十万人，散住在上千个贫穷小区中，不尽相同。在国际上，巴西的形象除了嘉年华、足球、辣妹之外，贫民窟

>>



在 Santa Marta 可见外国观光客正在看 King of Pop。此图由著名巴西艺术家 Romero Britto 所绘。Bianca Freire-Medeiros 摄影。

正是特色之一。在巴西国内，大量的文献指出贫民窟已经是论述和现实的共同指涉了：不平等、暴力、公民权等，都和贫民窟有关。这个过程中浮现了一个概念：“贫民窟观光”。这个概念作为了国际商品和交易的符号，已经被用在各种商品的广告中了，从 Citroën 和 Nissan 的车子、Ikea 的家俱等等都是，其他包括餐厅、书店、俱乐部也是。作为观光景点，这是全球化论述和实践的其中一环，将贫穷重新指涉为消费的商品。另一方面，这也是实境观光的其中一项。观光客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保

护下，其实很安全，然后又可以看到和世界迥然不同的景象。

在巴西，政府一开始是忽视这个现象的，并且总是大力抨击之。巴西的精英则是认为贫民窟观光有损国家的形象，并且把穷人当作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一样展示，是很卑鄙的行为。现在，人们则要重新设计这个贫民窟观光事业，借着世界杯足球赛(2014)和奥林匹克运动会(2016)的举办要推销这个城市。有两个事件是历史上促成此发展很重要的转折，帮助我们理解这整个轨迹如何形成与巩固。

> 1996 年 1 月

Michael Jackson 到巴西发表了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的音乐录像带，由 Spike Lee 执导。在 Rio de Janeiro 的 Santa Marta 贫民窟位于南区的富裕地带，主要就是要呈现政府如何默视这个贫穷小区的蔓延与恶化。

虽然 Santa Marta 贫民窟的人很欢迎这个点子，政府却很火大。Rio de Janeiro 的州长 Marcello Alencar 要 Michael Jackson 证明他出自善意，并且要拿出钱来帮助该小区。前足球明星同时也是后来体育部长的 Pelé 则认为这可以帮助巴西争取到举办 2004 年 Olympic 的机会。

而政治温度上升到最高点时是因为有消息指出租借场地和雇用居民的费用已经由 Spike Lee 和 Marcinho VP (Santa Marta 最大的毒梟) 桥好了。结果政府命令停止拍摄影片，认为已经损害到巴西的观光业了。Lee 则称巴西是“香蕉共和国”，更加激怒了巴西政府。

> 2010 年 8 月

Santa Marta 贫民窟欢迎当时的总统 Lula。Rio de Janeiro 州长 Sérgio Cabral 和 Rio de Janeiro 市长 Eduardo Paes 揭幕 Rio Top Tour 的观光计划。这个计划有来自于巴西观光部的大力支持，还有 Pacifying Police Units (UPP) 的背书。¹

总统 Lula 认为 Rio Top Tour 观光计划是相当具有潜力，并可以藉由纳入居民来补偿他们。此外，政府也支持这个旅游计划。讽刺的是，过去拒绝 Michael Jackson 的城市现在竖立了这位流行教主的青铜像，并且成为了 Santa Marta 贫民窟的大热门景点。

> 2013 年 5 月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在不只包括 Santa Marta 和许多其他贫民窟的地方，市场认证正在进行中。这是国家支持的政策，而且广受社会各界好评，特别

是由贫民窟自己发起的。从 Foucault 的角度来看，治理型态不仅仅从外部而来，还从内部那些贫民窟观光企业家的自由主自主而来。

用 Boltanski 的话来说，贫民窟作为观光景点的价值现在已经由这个观光事业的效率所决定了，也被贫民窟的居民影响，更会被其是否有能力展现所谓的贫民窟面貌而影响。这些包括了贫穷、混乱、暴力、欢乐等等。照此逻辑，观光客也会从这个市场逻辑来评价这个景点。观光客因此是消费者，透过他们购买门票、纪念品、食物饮料等等，将为此个贫民窟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

很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国家的退位。贫民窟的观光需要政府的同意，但是内部的实际情况是被法律或非权力的权力所结构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管制国家领土的一连串策略，并且深深地被市场所决定。■

注 1：2013 年 4 月，有 32 个位于 Rio de Janeiro 的 favela 被重新美化，用的是同样的策略：在 BOPE (Special Force Unit) 之前政府就先介入，让罪犯先

> 孟加拉

成衣工厂倒塌

事件的背后

by Mallika Shakya, South Asian University, Delhi, 印度



Savar 事件中的两位罹难者身影。Taslima Akhter 摄影。

于 2013 年 4 月在孟加拉国的 Sayar 之工厂倒塌事件中，共有 1100 名成衣工人丧生。尽管引起了大众的愤怒，可是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至今还是没有受到重视。

那些对于成衣产业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个产业很危险，所以发生在 Sayar 的惨剧其实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有成衣工业的国家里面，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即使如此，在地的工人和工会对于这个事件的反应很慢，反而从欧洲和美洲的销售商和顾客的反应非常大，也有各种不同角度的诠释。

> “东方主义”的报导

“这是孟加拉国的另一场悲剧” New York Times 如此报导。这个描述也被 BBC、Globe and Mail、Reuters 等采纳。这些西方媒体都不愿意把这个事件看成第三世界因为贪婪资本家，腐败政客，无能政府共生下所造成的悲剧。事实上那些穷人别无选择，为了餬口只好把自己暴露在高危险的工作环境之中。东方主义的观点也是理性主义的观点，因为这种看法让那些布尔乔亚的贩卖商认为解决方式只有靠工厂本身以及消费者的行动。

媒体一开始把矛头指向工厂的主人 Sohel Rana，因为他说工厂很安全。四天之后，当死亡人

数到的四百人，开始有消费者捐款给罹难者。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到达了七百人，欧盟开始说要抵制孟加拉国出口成衣到欧洲。一个月后，死亡人数来到了一千一百人，孟加拉国政府开始允许成衣工会的设立。接下来，联合国开始质疑世界银行对于世界各国商业指标的正当性，认为把工人的弹性视为是工业的竞争性这个预设大有问题。

劳工组织一直是这次灾难的核心。许多在 Rana Plaza 死亡的工人是由于他们被迫要继续在墙壁破裂的状况下继续上工。他们没有工会。在这个工业民主的国家里面发生这种事情，和那些在地与国际的资本家，以及政府脱离不了关系。国际的资本让工人变得更不可见，被隐藏在世界银行经济或贸易指标的后面，而且这些行动者一再强调由资方和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产业中，生产力和工人安全更能大大提升。在这个霸权底下，工会无法成立。不论在孟加拉国或是其他亚洲各国的成衣产业中，皆是如此。这种把劳动过程去政治化的想法就是把工业视为只是供给与需求的市场法则，完全忽视任何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

> 多重纤维协议 (MFA)

把市场看作是成衣工业全球化的唯一驱动力，



在多重纤维协议之后的成衣贸易变得相当竞争，而且整个产业更加危险。

这个看法大有问题。没错，这种劳力密集的产业的确吸引了许多移工，也带来了销售店家的增加。19 世纪美国毛织业多数是东欧的犹太女性，而 20 世纪中期之后便转向了亚洲。但是，成衣工业全球化和美国政府的政策大有相关，也造成了今日全球化分工的场景。

多重纤维协议 (The Multifibre Arrangement, MFA) 制定于 1974 年，内容规定得巨细靡遗，主要就是规定有多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成衣可以进口到已开发国家。每一件进口到美国的成衣都必须先拥有“visa”之后方可进口。在美国的利益主导下，潜在的威胁者如中国只被赋予少量的额度，像是孟加拉国等其他国家就拥有高额度。所以这不难想象为什么 1970 年之前没有什

么成衣业的孟加拉国会在短短几十年间就有 3.5 百万的成衣工人。

MFA 当时只被视为是暂时的，不过后来协议延长了四次。在 1977、1981、1986、1994 分别延长了，并且更加深化其影响力。可是，当世界贸易组织 WTO 在 1995 年成立之后，MFA 被视为要在 2004 年 12 月后永久失效。失效当然是转变了全球的成衣产业结构。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认为成衣工业从此会垮，中国和孟加拉国则成为新的赢家。这助长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压低工资，工作条件恶劣，一切都为了竞争市场被合理化为必要之恶。

MFA 的短视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在孟加拉国的成衣工厂都如此破烂。发给建厂执照

给 Rana Complex 的市长之所这么作，是因为主管机关非给执照的速度追不上成衣工厂的设立速度。所以，若只是追究工厂主人和几个商家的责任，就像是处罚种族主义者却不责备种族隔离制度一样，没什么道理。这场灾难造成的社会抗争和怒，已经在侵蚀整个国家的稳定基础。这也是全球贸易失败的象征，也看到了企业像是 Rana Complex 和 Joe Fresh 的无动于衷。■

> 你的论文被外包了

by Jeffrey J. Sall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美国



菲律宾论文外包的工作场景。。

像许多其他的科学家一样，我长期以来就很好奇我的论文发表在期刊后到底命运为何。若出版了，那有可能就是被总编送到了

其他编辑手上，可能就在隔壁而已。数十年来，出版媒介的物理限制，亦即论文纸张有质量，让论文不能大量且迅速地传播的很远的地方，于是就让出

>>

版的过程有地理上的集中化倾向。期刊杂志的办公室、编辑人员、印刷厂等都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城市，甚至在同一栋办公大楼里面。他们之间通过各种组织或是人际网络串连起来。

但是这个传统的模式渐渐没落了。我过去几年致力于研究“知识外包”(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KPO)的现象在东南亚如何产生。我进行了许多厂商的田野研究，包括在全球北方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雇佣了许多年轻人，给他们很最低工资，长时间工作，做复印编辑、排字、电子校对等，好让整个过程可以和国外南方的企业连起来。

> 出版的巨兽

若 KPO 的厂商是知识生产炼的富士康，那么谁是苹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科学出版的结构转型过程。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不是在各个学术单位内的出版社所链接起的网络，而是近期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总编所说的出版巨兽。

这些是庞大、公开得交易厂商。他们相当具有侵略性地去取得学术期刊的所有权。虽然像是社会学或人文这种软科学的期刊还没有被他们盯上，但是自然科学等硬科学则完全沦陷了。期刊都被这些

庞大的出版巨兽所垄断，并藉此获利。

最恶名昭彰的例子是 Elsevier B.V.。这是一家在 Amsterdam 的出版社，是 Reed-Elsevier 集团的子公司。这个集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榜上有名。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导，Elsevier B.V. 拥有超过 2000 份学术期刊，占据了 25% 的学术与科学发表量。2012 年其边际获利是 40%。

最近许多科学家抗议抵制这家出版商的期刊，理由是他们对个人与机构收取了过高的期刊使用费。可是 Elsevier 的经营模式早就被广泛模仿采用，渗透到了整个学术之声生产过程之中了。

> 供给炼的组织

出版商也使用许多科学家在研就上与同事合作的技术，像是电子邮件，文件传输协议，文本编辑器，云端数据等，可以让整个出版过程轻易结合在一起。作者可以用电子邮件把档案传给编辑，同样地，期刊也可以把这些档案轻易地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

新的科学出版巨兽，像是 Elsevier，早就抓住这个科技浪潮，把出版外包了。下游的承包商竞争地去得到一或两年的合约，而成功的承包商当然就是承诺用极低的价格贩卖质量好的期刊。这些生产的模式其实也在许多的

工厂中早就行之多年了。这些工作被去技术化，工人要不断地产出，直到被取代为止。

为了解释这个 KPO 生产过程的复杂性，我可以说，你的下一篇论文一定是被外包制作的，被送到一个有 40 到 50 条生产线的地方，当然在全球南方，然后那些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 0.5 美元。

例如，从我的田野经验中，整个论文加工的过程如下：作者的论文接受刊登之后，出版社开始把整批的论文送到菲律宾，透过 FTP 的方式，然后一些前置编辑就开始处理边界、排版等手续，插入 XML 标签。接下来还会被送到印度，印度那边有很多大学生接受了短期编辑课程的训练，好可以赶快上手去检查文法、文句的错误。最后整个论文又被送回菲律宾，把论文制作为可以出版的 PDF 格式。

看到目前为止，其实许多相关的工作人员多少都有基本的英文阅读能力。不过，现在这个 PDF 档案的时代，最末端的工作是分包到越南。越南的工人不需要懂英文，因为他们只要注意排版、空白、间隔大小等，然后把档案送到菲律宾。还没结束喔，接下来菲律宾那边要进行最后的出版工作。整个过程不会超过 2 个星期。

> 学术富士康化 1

>>

我们社会科学家怎么去响应这个论文外包的问题、实践社会正义呢？这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若我们抵制某些期刊，那么只是助长了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这些工作可以由印度人和菲律宾人作，也可以由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作，那又为什么应该把他们排斥呢？

此外，若是我们论文的质量被这个系统所影响了，那我们就更有理由像上述这么做了。但是似乎外包制度在供给货物上又很重要，就像我看到在ISA的会议上苹果的笔电从不短缺，但是你也知道我们都不喜欢苹果剥削劳工的制度，尤其在亚洲的供给炼上更是如此。所若是我们的学术论文继续外

包下去，那我们变成就是继续为这个不正义的体制背书。

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要求透明化。我们可以要求我们的论文更加公开透明。出版商向来很努力地把整个供给炼的过程遮蔽起来，像是不准编辑跟作者透漏其国籍等身份。但是这却违反许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标准流程。美国的汽车厂商会报告有多少零件是在美国生产的。苹果也标示“美国设计、中国制造”。所以，出版商更不能有特权去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若是他们同时压低成本又提高售价，那我们学者，同时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就更有理由去要求知道那些将我们论文加工出版的工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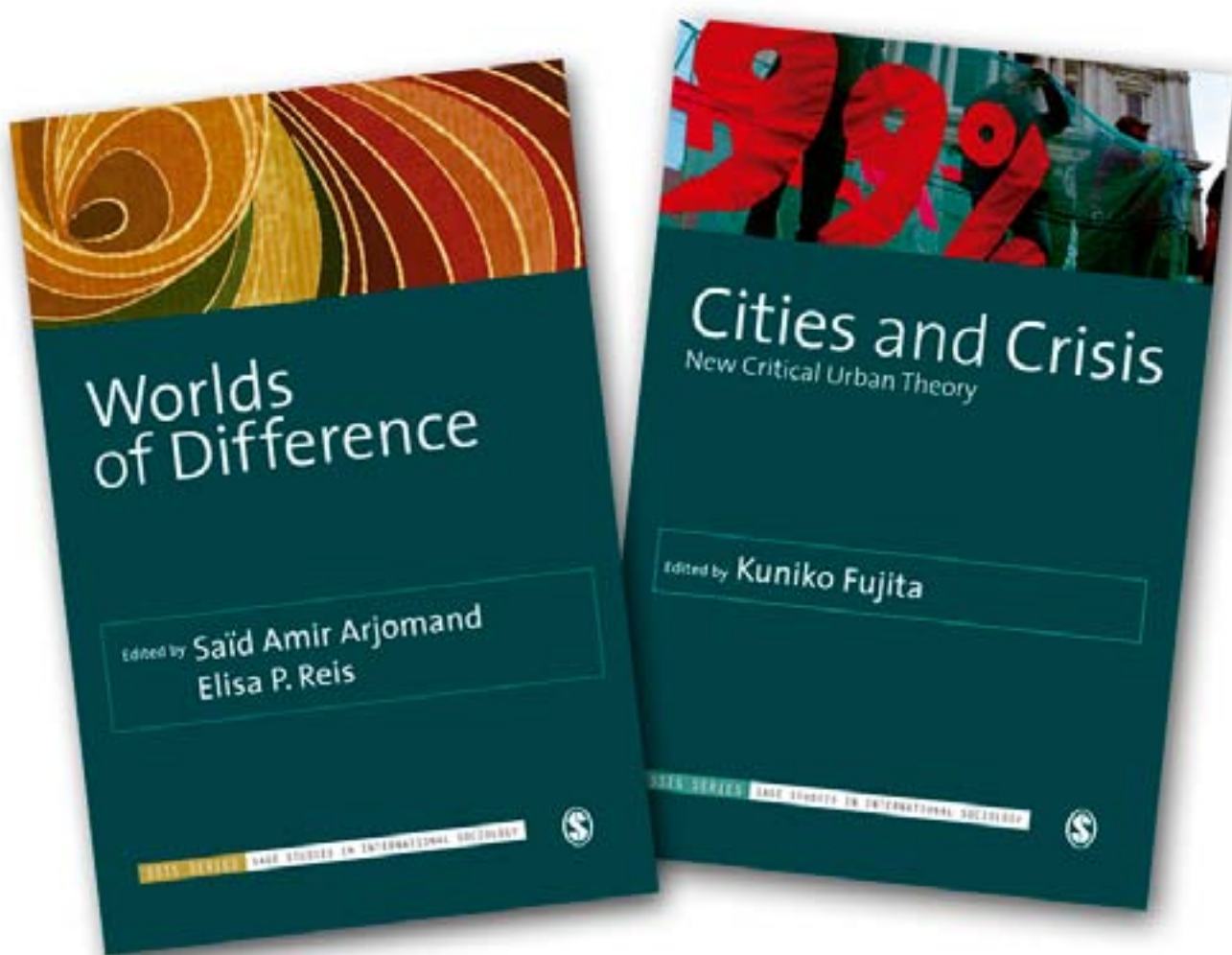
谁，其工作环境为何。■

注 1：富士康是一间台湾的公司，是 Apple 的合约厂商。在 2010 年位于中国的工厂爆发劳工跳楼事件。

> 优惠价格 的书籍

for ISA Members

by Sujata Patel,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编辑



SSIS 系列的两本书，在印度可以优惠的价格购得。

ISA 的会员应该会很高兴听到这则消息：今天起，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SSIS) 的出版书籍将一律 9.99 英镑，这几乎是原本价格的

>>

10 分之 1。而且还包括邮资。我们公布这个好消息的同时，也要告诉各会两本新书的出版：Worlds of Difference，由 Said Arjomand 和 Elisa Reis 编辑；Cities and Crisis, New Critical Urban Theory 由 Kuniko Fujita 编辑。在印度的 ISA 将可以以 Rs 750 的价格购买。（出版日：2013 年 8 月）。详情请见 http://www.isa-sociology.org/publ/isa_handbooks.htm。

另外我们也展开了另一个新计划：Key Texts of World Sociology。这是为了推动在大西洋地区之外的社会学文本。这些文章书籍将会把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书籍都会聚一堂。目前我们主要收集来自下列地区：(1) 东亚（中国、日本、韩国、台湾）；(2) 拉丁美洲；(3) 中、东欧（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4) 非洲；(5) 阿拉伯地区。

SSIS 是 ISA 最具历史传统的出版项目之一。其原本叫做 Transactions of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从 1949 年第一次世界大会开始出版。后来在 1974 年改称做 SSIS。从那时起 SSIS 就开始出版世界大会的论文集、各个研究委员会或是国家学会的会议论文等等。也包括了各种形式，像是著作、编辑、主题论文、手册、参考书籍等。这些总共超过了 60 本书，可谓贡献良多，并且对各个领域之中各种辩论和讨论的介绍有着很重要的角色。

尽管有其重要性，SSIS 系列书籍的销售始终不高。或许因为售价高昂（80 到 90 英镑），即使在全球北方其主要销售也是在图书馆。全球南方甚至连图书

馆都没有采购。过去 3 年来，由于出版委员会和会长与副会长的支持，我已经协调 Sage 出版社（伦敦）可以再印度以很的低廉的价格贩卖（大约 10 英镑）。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国际（全球北方出版的书）和在地（全球南方出版的书）的分野。在印度出版的书籍和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地的书籍是就是专针对地方市场去销售，全球北方的则相反。所以国际的出版商（像是 Sage、Oxford、Routledge）在低地开发的国家中有贸易协议，让这个分野更加稳固。

然而，这个问题可以有处理方式。我们已经让 Sage 的 SSIS 的出版转移给 Sage 于印度的分支，并确定 ISA 的会员可以得到很大的折扣。我们也将可以用便宜的价格卖给印度读者（非 ISA 会员）（虽然在其他国家仍非如此）。我们很感谢 Sage 支持这项方案，让我们可以为打破出版的国际不平等踏出重要的第一步。我鼓励 ISA 的会员用这个机会去使整个政策更成功。购买 SSIS 的书籍吧！也购买以后 SSIS 系列的书籍吧！■

> 两种社会主义

by Mariya Ivancheva,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匈牙利



Misión Ribas 是个社会正义机构，或称为 Bolivarian Missions，由 Hugo Chávez 任内推动成立。其提供给中辍生上学的机会。

当我 2004 年在伦敦念书时，有一次我参加了讨论 Bolivarian 教育改革的会议，邀请来的讲者是委内瑞拉的教育者 Oscar Negrin。他一开始就说：“在委内瑞拉，我们不让小孩子背诵那些抽象的教条，取而代之的是教导他们重要的字，像是母亲、和平、Chávez 总统。”听到这段话，我的心跳加速了，因为我想起我在保加利亚的求学生涯。那时保加利亚还是社会主政权。有一次音乐表演彩排，我的老师 Toneva 同志要我握着我妈妈的手，然后朗读下面这一段诗：“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一是党的女英雄。”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党，只知道我母亲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我就把我的想法如实告诉我的老师。之后全班寂静了好一会儿，最终，她把那段诗句改了。一年之后是 1989 年，从那时候开始，我老师要我叫她“女士”，不要再叫“同志”了。让我们把场景拉回伦敦的那场教育会议。当我走出演讲厅，Negrin 和他的听众们想必看到了一个女孩的背影——这个女孩是 1988 年民主转型前夕还在上学的女孩——此时此刻跳走了。有句话这么说：“如果你不跳，那么你就是红的。”可是，矛盾的是，当我步出演讲厅，有两种感觉在我内心中拉扯：一个是我真的为我反对共产主义的家

庭感到自豪，可是另一方面，我常觉得共产主义早就一去不复返的想法，是不是太过于天真了呢？

我在委内瑞拉的高等教育改革这个议题上做了半年的田野研究。我了解到我的自豪是多么肤浅。我不是为了救赎我的反共思想而接触这个议题的，而是我对于两种教育体系的差异感到兴趣：一个是东欧，另一个是委内瑞拉。东欧的教育是从社会主义民主转型之后由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而委内瑞拉则是刚好相反。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CEU) 是我攻读博士的地方，在 1991 年由富豪 George Soros、东欧异议人士、以及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设立。这是一所私立的英语教学的研究所学校，被传统的法西斯、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所环绕着。其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新一代的后社会主义精英，知晓西方自由民主和欧美的科学思想。

相较之下，Bolivarian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UBV) 则是由总统 Ch á vez 所设立，教育社会主义精英。UBV 在 2003 年反对 Ch á vez 的政变和高技术石油工人的罢工之后所成立的。这两个事件背后受到美国国防部的资金支持，也显示出 Ch á vez 的石油资源重分配政策引起亲美的精英极大的反弹。Ch á vez 反对那些精英对于经济知识与资源的垄断，所以为了平衡这个霸权，他的教育政策 Misi ó n Sucre 让 UBV 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给半数以上的贫穷家庭。教育内容则以在地知识、跨学科、应用公共科学等为主。

我到了 Caracas 之后，心中总是戒慎恐惧。因为我从匈牙利的 CEU 来，可能会遭受到委国政府的质疑，尤其是我在旁听了第一堂在 UBV

的课之后，更加觉得如此。在那课堂上，讲者说 CEU 是专门帮忙美国训练 CIA 的地方。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了解到委内瑞拉并不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而我当然也不是间谍。我到的这个国家是有自由选举，而且媒体会监督政府官员的国家。我的报导人在 1958-1998 年之间所谓的“自由民主”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学生与知识分子。我从他以及他提供的讯息中，充分了解到我有多么大的偏见：我是保加利亚后社会主义学术下的产物，毫不批判地拥抱西方价值。在这些自我殖民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眼中，包括社会学家，都了解到可以躲在学术象牙塔内大肆批评那些落后的国家。然后把学生分为好和坏的，却从没想过是否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这种后果。最后，他们服膺西方的价值，坚持“客观的”科学，把一切其他非市场的价值贬为“意识形态”。

当我拥抱 UBV 的原则时，我了解这正在挑战着我。即使 1989 年宣称是“历史终结”了，但是在委内瑞拉，冷战还持续进行着。为了避免 1973 年智利的经验、古巴禁运、委内瑞拉的政变，委国政府不能强行实行教育改革。在整个 20 世纪左派奋力保护的学术自主性，很讽刺地现在被对手拿来当作武器。保守派为了防止革命，不断地复制不平等结构。穷人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使得政府让大学学历的人可以去 UBV 任教。这开启的双重标准的问题。学院中的人必须要了解学术语言，然后又要了解穷人的文化。这有点像是一方面服从学院规则，另一方面又马上破坏之。

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我，花了很大的时间去了解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面貌。而

今，我有了新的挑战。我被西方的学院左派认为是右翼分子，因为这些人希望看到拉丁美洲左倾。而另一方面，我在保加利亚，当我说委内瑞拉不是集权国家时，我被期刊杂志拒绝，认为我有党派偏见。庆幸的是，我的指导教授和同事都可以了解这种学术中的冷战氛围。无论如何，从伦敦那次的演讲后，我步出大厅，我知道，前方的路还很漫长。■

> Sofia 街道上 的故事

by Martin Petrov, Sofia University, 保加利亚



Sofia 街道上真正的clochard。

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头路，甚至连拾荒的工作也没有。他们露宿街头，从药房买来的药酒，加上饮水机的水，用垃圾桶捡来的瓶子，就这样喝着。这福景像就在国家剧院旁的公园里面。这绝对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例外场景，反

之，他们对此非常敏锐，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了生存的方式。他们是流浪者，是 Sofia 的 clochard 知识阶级。

当我还是哲学系的大学生时，我认识了 E。他是 Art Academy 的裸体模特儿，并在 Sofia 大学游荡。我的朋友则可以跟

>>

他要得到海洛因。E 的名字对于保加利亚来说是很陌生的，因为他的父亲是意大利籍犹太人，母亲是法国籍犹太人。他父亲是 Lukanov 首相最得力的助手，据说这位首相命令保加利亚的富豪在 1990 年把共产党的钱透过国家特务都发给了人民。在 1996 年 Lukanov 被暗杀后，他父亲就被下令要从此消失。他妈妈则是特务机关的会计，1990 年之后则对超自然现象开始产生兴趣，¹ 写了一本书叫做 *Man, Spirit, Cosmos: Energy-informational Exchange*。她最后到了尼泊尔的当修士，从此消失。

我并不是说这些故事都是真的，但也不是说这些都是捏造的。这些故事的的确确发生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保加利亚。所以，这是所谓 E 的生命故事。他在 1989 年以前在 Wiemar 的一间艺术高中读书。1990 年他到了 Magura——就是 Sofia 的一个角落，一个兑换马克和美元的黑市集散地。许多暴发户说他们在那边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那边他可以打赌球赛和赌牌。后来他在 Sofia 的

Drama Academy 毕业，可找到了工作，但是因为酗酒和吸毒，工作就丢掉了。之后只好在一家马戏团当小丑，表演高空秋千。

几天前我再次遇到 E，他失业了，可是戒掉了海洛因，独居在一间小阁楼里面。他透过在公园朗读诗文赚取生计、香烟和酒的钱。他仍然喜爱讲他把他的 Mercedes 撞坏的事情。我也见过他的朋友，这些人和他一样喜欢在国家剧院前的公园和药房喝酒。让我惊讶的是，不是只有 E 是这个样子，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有类似的故事。其中一人来自俄国，喜欢学斯拉夫语和文化；也有一个美国人，有三分之一的牛仔血统，喜欢穿牛仔靴子和 Crocodile Dundee 的帽子。很明显的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被社会所接纳，所以这些特别、具有异国风味的喜好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但是这之中的每一个人都记住了这几年来的美好时光。有人连同他的两个儿子被老婆逐出家门，有人在毕业后从来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许多人则

是拥有高学历。而且，由于还有许多亲戚、朋友，或是原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这使得他们不会陷入像是那些在公园拾荒的老人那般落寞孤寂。所以这种自我疗愈的方式也让他们与其他拥有类似故事的人有所不同。像是 E 喜欢说：“我不是 clochard。我是 cloch-art”。

他们看起来都像朋友，可是一旦我和其中的人开始独处时，他就会开始说起其他人有多糟糕，像是：X 已经跑掉了，并带走路人给他买啤酒的钱；Y 还在吸毒；Z 和很丑的女人上床了。他们被剥夺掉了一切，包括物质、承认、以及人生的期待，Sofia 的 cloch-arts 感觉起来格外的痛苦，强烈地需要自我的区辨，并且把其他一切的方法都抛弃（像是消费），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他们丢掉了一切，但保留了创意，以及一点点的邪恶。

1. 这是个保加利亚共党垮台后第一年相当热门的故事。可见 Martin Petrov,

“The Discourse of the Supernatural in Bulgaria of the early 1990s.” *Sociological Problems* 2010 1-2: 268-283（保加利亚）。

> 后共产保加利亚 对于大屠杀 的辩论

by Georgi Medarov, Sofia University, 保加利亚



这张图来自Belgrade的犹太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保加利亚警察正在监控犹太人的遣送，把他们从保加利亚的Skopje (Macedonia) 送到德国的集中营，时间是1943年3月。

就像 Maurice Halbwachs 告诉我们的，社会记忆和集体认同密不可分。1989年之后，最重要的公共辩论之一就是二战期间的保加利亚犹太人。这个辩论告诉了我们：过去深深影响了现在的政治。90年代，大屠杀成为了政治主体性中一个最主要的象征资源，亦即去区辨前共产主义和新反共产主义的能力。两个政党都有相同的政治愿景：加入欧盟、新自由主义、民主化等等。而且保加利亚的社会学者 Andrey Raitchev 已经观察

到这种区辨已经投向过去：“法西斯主义出现在社会主义之前吗？”反共者的意识形态是保守的历史重新定位论，主要标语是“45年来受够了！”，并且宣称法西斯是共产主义者的夸大、为了显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而发明的论述。而前共产主义者则称其对手为法西斯主义者。这是个老议题了，可是当碰触到了保加利亚犹太人议题时，火花继续四射。

> 对待犹太人的两种论述

二战期间保加利亚加入的轴心国，并且被 Macedonia 所征服，也就是现在北希腊的塞尔维亚。在旧保加利亚的犹太人被迫害，被剥夺公民权，歧视，剥夺财产，驱逐、下放劳改等等。但是最后被反法西斯主义与精英所限制住了。新的保加利亚犹太人则被迫逃亡到 Treblinka。

这些事件被前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所争辩。1990年代党报的社会学报导由 Institute for Critical Social Studies 所执行，指出前共产主义

>>

者专门聚焦在犹太人的消失议题上，想说明社会主义的法西斯本质。而反共者则聚焦在旧保加利亚的 Final Solution 上，特别讨论精英的抗拒所导致的结果。他们都不重视反法西斯战斗分子的角色，尤其这些人比共产党人有力，但是共产党喜欢把他们描述成罪犯。

两种论述都显示出了对于承认对方论述有其道理的无能。保加利亚社会学家 Lilyana Deyanova 称这个现象是后共产的否定主义。否定并不限于针对过去，反之，也标示着对于他人立场的肯认的无能为力。主体性镶嵌在这种社会记忆之中，把对手的观点当作永远地敌人来对待。政治上的敌对主义用各种言语诋毁对方；变态、叛国、欺骗、侵略者等等。在这样的“反(anti)”论述中，民族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把辩论简化成政治问题：犹太人有被拯救吗？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或是法西斯？很可惜，我们看不到其他立场。

2001 年后，稳定的政治认同瓦解了，两党体制取而代之。当论及犹太人的命运时，反共的论述相当普及。战后共产党论述不具正当性，包括那些反对法西斯的论述皆是如此。驱逐犹太人被解释成“我们别无选择”或是“这些土地也不是我们的”和合理化。可是，矛盾的是，这些都在以下的论述框架中进行：领土扩张是“解放”或“保加利亚的统一”。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些论述的巩固，也投射到 Macedonia。这被保加利亚主流的政治与媒体视为是“错误的历史”。所以最近在 Skopje 建立的大屠杀博物馆被描述为假的、空洞的等等。这不仅是共产党这么说，Macedonia 人也被视为是敌人，在保加利亚散布大

屠杀的不实谣言。

> 避免法西斯主义

从 1989 年来的记忆政治反应了纳粹的反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法西斯理论的简化版本出现在国家社会主义时，起源于 Dimitrov (保加利亚的共党领袖) 的经典定义，把法西斯简化成阶级。但后来这个理论被取代了。大屠杀则被简化成沙文主义的背德，争论我们是善良或是邪恶的。有一个必须要被辩论的议题是：为什么避免去指责国外势力强加歧视与不容忍的政策，却讨论法西斯主义如何被传统的公民社会所抵制？

真相是，法西斯主义在保加利亚被认为不具有法西斯的特质。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所以没有法西斯主义。所以对于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也付诸阙如。例如，没有关于 Zeev Sternhell 对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此外，也没有法西斯主义的破坏主义，把公民身份的彻底毁弃，反共主义，以其纳粹的 Judeo-Bolshevism。总之，有股有意识的力量在刻意避免法西斯的概念，以避免平行而生的后政治乌托邦。不幸的是，这些空白不只是出现在政治中，学术中也是如此，社会学亦如是。

政治与媒体的主流称赞“保加利雅英雄主义”，战时的“公民社会”，以及“拯救了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强加这种观点来诠释过去。主流对于那些支持纳粹的“公民社会”视而不见，包括那些对于 Final Solution 支持执行的运动与官员。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公民社会所指为何？谁阻止了保加利亚驱逐犹太人？这个背后显的是

保加利亚是个复数名词。

然而最近出现了由历史学和社会学者的批判。2012 年末，最大的人权 NGO 组织举办了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会议，叫做“知道你的过去”。主要是把相关的学术研究推广给一般大众。可是这个会议并没有引起广大共鸣。而且，新的风险是批判主流观点和对于学者的称赞可能会导向其反对方向一鄙视所谓的志愿的执行人大众。■

> 马来西亚的 社会科学

by Shamsul A.B.,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UKM), Kuala Lumpur, 马来西亚



Raymond Firth (1901-2002)是马来西亚殖民时代社会学创立的重要人物。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正式成为大学中的系所和科目之前，他们就是殖民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且启发了马来亚的想法，而在1963年之后，这就是马来西亚。

在殖民时期，殖民知识提供了定义与规则的架构，让殖民者可以顺利统治。这个定义与规则的架构，亦即“分而治之”。殖民政府就是这么统治殖民地的。大英帝国皇家学院成立于1823年，就是个殖民知识最主要的机构，帮助统治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其在马来西亚的分支机构是设立在 Straits Settlement of Malaya and Borneo 底下，于1878年成立，由 Calcutta 的东印度公司营运。这个分之有其自己的期刊：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SBRAS)。1923年改名为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然后1964年叫做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皇家学院也发表自己的 MBRAS 文章。

大约135年来，马来西亚这个概念就是从该学院的出版文章中产生的。文章的内容涵盖了历史、地理、文学、语言、文化、小区、植

物、动物等。最主要的作者都是殖民政府的公职人员，拥有剑桥、伦敦、或牛津大学人类学学位。John Gullick (1916-2012) 是其中的一位，撰写了至少十几本关于马来西亚的历史与社会的专书，并且用历史社会学的名义出版。许多书后来都成为了教科书。

因此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在二次大战之后，那些被殖民政府送来的学者之中，有两位是世界知名的研究者，他们是社会人类学者 Raymond Firth 和 Edmund Leach。Raymond Firth 来马来亚作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Edmund Leach 则是作马来亚和 Sarawak 的社会经济研究。两位学者都有许多学生，也都在1950年代早期从事马来亚本土的田野研究，看 Sarawak 的华人和原住民，也在新加坡研究马来人和华人的文化，在 Negeri Sembilan 研究唯一的母系社会，另外也于 Johor 研究 Kiyai Salleh 千禧年运动对于马华两族群之间关系的影响。这群人生产出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

下一代的学生则是在伦敦 Firth 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包括 Abdul Kahar Bador (研究马来传统领导)，Mokhzani Rahim (马来信用系统) 和 Syed

>>

Husin Ali (马来农民和领袖)。这些人后来都回到 University of Malaya (UM) 教书。另外一位有名的学者是荷兰训练的 Syed Hussein Alatas, 他出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1977)。这本书启发了 Edward Said 的 *Orientalism*。这些学者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支柱。

在 1969 年 5 月 13 日之后, 上述的社会人类学者其实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在“治疗过程”之中他们透过参与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 的活动把和平和稳定带给了这个社会。一份 Ford 基金会的报告 (民族同一的社会科学研究: 对马来西亚政府的信心报告, 1970) 中引介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沟通研究对于马来西亚社会科学会成立的重要性。该学会于 1978 年成立。这份报告也为政府所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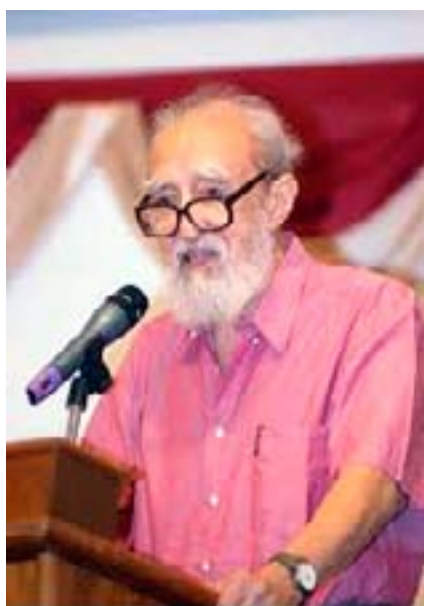
政府也于 1969 年 7 月成立了民族认同系。这是在族群暴乱之后随即成立。许多职员都是人类学或社会学者, 并且多数毕业于马来研究系。的确, 在 1980 年之前, 许多马来西亚的高级公职人员都是来自这个系。

第一批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从 UM 和 UKM 毕业, 时间分别是 1974 和 1975 年。

这些人都在公部门或私部门有好的工作。在那里他们都发现非常需要通才, 因为这样才可以对各种当代问题了解并研究。这种可以跨越多种文化的能力, 在马来西亚这个多族群的社会中特别需要, 至今仍是如此。一位人类学讲师 Tan Chee Beng 编辑了 *Bibliograph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1999), 并且特别对于族群关系研究有很大的贡献。2005 年, 内阁决议要将族群关系课程列为公

立大学的必修科目。该计划的内容就是由我领导的团队在 2007 年所研拟出来的, 并且在 UKM 成立了族群关系学院。

总之,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科学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别在凝聚社会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都和“马来西亚”这个概念不可分割—多元社会、多元族群的精神, 也蕴含了社会的稳定动态张力。



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 是马来西亚公共知识分子, 也是政治人物, 同时也是社会学的创建者之一。他也是著名的殖民主义批判家。

> 社会学志业的一生

访谈Dato Rahman



Dato Rahman Embong.

Rahman Embong 是杰出的马来西亚社会学家，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以下的访谈呈现出了其个人生涯和马来西亚社会学发展的交织故事，时间从殖民时期开始，一直到 1991 年后的新生。

布：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你在殖民时代长大，你是怎么受教育的？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成就。

RE：事情是这样的，Michael，你最近到过马来西亚，知道这是一个产油的国家，有 2 千 8 百多万的人口，收入高，到 2020 年将会成为已开发国家。走到这一步，其实历经了很长的时间，从农业到商业社会，那时是 1957 年的独立时刻。你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带你去了首都 Putrajaya，那之前是一片大的橡胶和石油田，原住民 Orang Asli 居住的一大片丛林地。有些人认为行政中心相当耀眼，是个顶尖的城市，许多国家都羡慕不已。这些是 Mahathir 想要完成的梦想，想要留下来的政绩。

现在让我回到我的身世。我出生在一个“中产”的农人家庭，不特别富有，

>>

但是也不会太穷。我的出生地是 Terengganu，那时是马来西亚半岛之中最落后的一个城市。我生于 1944 年，当时日本占领已经快结束了，但是日子很艰难，因为食物短缺，需要配给。我爸爸是位 padi 农民，也是伊斯兰教的学者。他不让他的小孩上英语学校，而要去阿拉伯或是宗教学校。他也诅咒英国，因为英国人在日本攻过来时落跑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相当勤奋工作，耕作我们家的 padi 田来养育 8 个小孩。我是老么。其他的邻居也都是耕田维生，这些农民一点也不是外面所描述的那样懒惰的原住民，这种东方主义的歧视论述后来被 Syed Hussein Alatas 的 1977 年的书所不以为然。

我的父亲于 1949 年过世。那是我出生后的第 5 年。人家告诉我我爸死于疟疾，发疯数日后死去，而我那时相当难过。但是今天，那些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医院、诊间、医生等，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死因究竟为何。我父亲过世后，我母亲的生活更加困苦，为了养育 8 个小孩，她成了小贩，卖蔬菜、饼干、烟草等维生。

身为家中老么，又还在上学，我不用向我的兄长们那样帮忙家务。不过我还是跟我妈到市场去卖菜，帮她搬运东西。那是个典型农村社会。

在我们的那个村子里面，没水没电。我家从没有桌子和椅子。晚上我们都点煤油灯念书。我的哥哥都上马来的小学，然后多上了一或两年的阿拉伯或是宗教学校。最他们都没有继续升学，去工作了。不过我比较不一样。我妈妈和其他哥哥不希望我跟他们一样，希望我到村子之外去发展。所以我小学毕业和宗教学校毕业后，我到城镇上的英语学校就读。我特别对“特别马来课程”感兴趣，因为这样我可以在第三年生到 Primary Six。后来我成绩是最顶尖的，得了奖学金到 Royal Military College 去念书。这个学校在马来亚的西岸，是个精英的多族群学校，由英国人在 1953 年设立，主要训练在地的军事和政府人才。整个

Terengganu 之中只有包括我的 5 个人上大学。我又是唯一一个到其他城市并且出国留学的人。

在高中毕业后的大学期间，我到了“母国”英国，因为有得到联邦奖学金，希望我们将来可以回国担任公职。许多其他的顶尖学生也是如此。

布：你到英国留学，特别是在 Leicester 和 SOAS 的经验如何影响了你的学术生涯？

RE：到英国念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从此大开眼见，并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于 1965 年到 Leicester 念社会学，于 1968 年取得学士，后来在 SOAS（伦敦亚非学院）拿到了区域研究的硕士。我上了许多知名学者的课。60 年代后期，伦敦和整个欧洲都有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并且反美帝，反越战。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又是其中很让人向往的事件。我那是受到各种社会学学派思想的洗礼，从结构功能论到马克思主义，再到社会建构论，也阅读各种左翼期刊，像是 New Left Review 和 Monthly Review。因为这样，我变得很政治化与激进化。许多我这一代的马来西亚的学生都是如此。

布：你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呢？那时国家已经独立 15 年了，你怎么重新认识这个新社会？

RE：我在 1970 年 12 月 31 日回到马来西亚，那是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种族流血冲突后的第 19 个月。我那时候教育许多年轻人，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其他等等，然后团结他们。我们认为问题不是种族，而是阶级。

RE：回国之后，University of Malaya 主要是以英语授课，新的大学是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 UKM)，于 1970 年 5 月成立。这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努力的成果，希望用民族的语言——马来文教学。马来文

政策在 1980 年有全面的影响，学生当时是精英，只有 18-24 岁这个族群的 1%。不像今天已经到了 30%。

布：社会学呢？

RE: 社会学那时发展得很快。首相的系上的 Harvard Advisory Service 由 Samuel Huntington 所领导，并有 Manning Nash, Myron Weiner, 和 Nathan Glazer 等人，写了一份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 National Unity 的报告，发表在 1969 年的冲突之后，建议马来西亚大学要处理这个问题，也希望他们可以训练这方面的人在。UKM 因此设立了人类与社会系。所以当我回国之后，我就到 UKM 任教。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需要我这个硕士的专长，特别是我在伦敦的训练。我心中也这么想：这份工作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

布：1970 就像是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年代，尽管 Harvard 的团队关心的是民族国家建造，我的理解对吗？

RE: 在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初期是如此，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发展的大好年代，有许多辩论进行着。但是让我说一下这个 Harvard 团队。首先，我是 UKM 人类与社会系的第四个老师，其他三位都是 UM 毕业的。事实上在 1960 年代，也就是 Harvard 团队之前，人类和社会学已经有人授课了，是在 UM 马来研究系的文化课程底下，知名的学者包括 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Syed Hussein Alatas (后来到新加坡) 和 Syed Husin Ali。所以当我们说马来西亚的人类与社会学是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产物，那么 Harvard 团队不是催生者，因为早有人在孕育播种了。

大辩论在许多学科之间进行着。文学的学者特别如此，坚持民族文学的制度化，推崇社会的艺术，抨击纯艺术。历史学者则拒绝殖民（东方主义）的史观。经济学者辩论“巨变”。我们这些年轻社会与人类者则辩论批判实证主义，结构功能论，现代化理论，特别是那些

Harvard 团队的观点。

在其他方面，这时也是伊斯兰 dakwah 运动的开始。这是学生和青年运动的一部分。校园内为了这个议题而有反美帝、反越战、反以色列等的运动。内部我们则支持农民斗争和无住屋者的抗争，也关心贫穷问题，因为这是全人口 50% 面临的。另外我们也反贪污和精英统治。

我个人来，这是我在英国学术生涯和学运经验的延续。我有社会学理论作为指引，教了两门课：发展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而我的同事教其他科目像是农村社会、都市社会、种族关系等等。我在 1973 年开始的专栏叫做 Truth，但后来被禁了。我朋友和我在里面不只是写社会学议题，那还是一个公共社会学的形式。尽管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没有所谓的价值中立，也没有现代化理论所说的多国组织发展。我们认为发展和低度发展是一体两面的。

布：后来经济危机来了，你可以谈谈这个历史和社会学所给的影响？

RE: 1974 年是另外一个对许多人来说的生命转折点。当年 8 月在 UKM 举办了第一次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大回。我是筹办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会议，许多辩论产生，也辩论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另一个典范之战。许多大学的讲师和学生很积极的参与。那时也决定在 1978 年成立了马来西亚社会科学会 (MSSA)。

学生运动在 1974 年来到高峰，后来被镇压后就好景不再。那是个转折点，是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位当今反对领袖 Anwar Ibrahim 那时领导穆斯林学运，后来被逮捕入狱，后来释放后，他被首相 Mahathir 延揽入阁，后来成为副首相，直到 1998 年关系生变为止。

学院之中其中一位资深社会学家 Syed Husin Ali (UM) 也被逮捕，并服刑 6 年直到 1980 年。有趣的是他即使服刑仍

然保留教职。他的名望很高，出狱后不久当选 MSSA 的会长。他担任 10 年会长，到 1990 年为止。

1975 年，也就是大规模逮捕后，政府更加严格执行 University Colleges Act。这是一个箝制学术自由和大学自主的法律。这个法律一直到去年才被修改掉。

布：1991 年政府和反对党之间有了妥协，大学重新开放，那你这段期间呢？

RE：嗯，你或许可以猜到，我为了避免被逮捕，必须在 1974 年后出国，所以离开了马来西亚 20 年。不过我还是很关注其发展。

1992 年我回国，也是冷战结束后的几年。政府开放了许多 UKM 的职位，让我有机会可以在 1995 年回到原本的系。事情都变了，大学和政府都服膺于市场规则，教育也商品化，不再是公共财。传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包括社会学与人类学，都被科学和管理所超越了。我学校的社会科学的也变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再是一个系，剩下一个小的分支。

许多我这一带的资深社会学者和人

类学者不是退休就是继续教书。可是仍有一位社会人类学者仍然很活跃，他是 UKM 族群研究的创建者，从事学术和政策研究。

对我而言，我在系上重建之前离开了，后来成为全职的研究员，从事跨学科研究，在国际研究院，成立于 1995 年。后来我在 2001 年成为发展社会学系的教授，2009 年荣誉退休。

当我回国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重新接触 MSSA。我在 2000 年当选为会长，就像 Syed Husin Ali，我担任了 10 年任期。卸任之后，我是该会的特别顾问，至今仍是。

布：你见证了马来西亚社会学 40 年来的发展，那你怎么看未来？

RE：尽管变化很大，我仍然觉得充满希望。年轻人重新对社会学燃起了热情与希望，不过是透过跨学科的方式。他们可以看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观点的里亮，也可以使用方法去分析是。理想性还未消失。虽然整个社群不大，但是成长得很快。MSSA 可以帮助看到这些改变，而且现在和身为 ISA 会长的你对话，Michael，你可知道这有多么的迫切。这让我们深化和拓展了视野。我们期待日后有合作的机会，想必让马来西亚社会学更加有帮助。■

> 革命后的 突尼西亚社会学

by Mounir Saidani, University of Tunis El Manar, 突尼西亚



Mohammed Bouazizi, 一位点火自焚的水果摊贩，触发了阿拉伯革命。

突 尼西亚社会学家有三个矛盾的观点来解释现在的突尼西亚：政治巨变，言论自由扩张，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到来。突国快速的社会变迁让社会学家必须响应这个变化。

> 后革命脉络

Ben Ali 的独裁在 2011 年 1 月 14 日划上句点。从此整个国家历经了“反对一切事物的战争”。冲突不断上演，新的公共敌人是 Salafists，因为其被认为是对于突尼西亚最有威胁的。甚至慈善、文化等 NGO 组织也在政治领域中出现很大的冲突。约有 150 的政党以及 15000 个组织，很难达到相互的理解。

社会统计和其他资料现在变得可加容易取得，可是很没有组织，所以也不太能够帮忙建立起系统性的知识。有了言论自由，杂志、报纸、媒体、电视、电台等等也都成为了意见抒发和斗争的场所。

过去的行动者影响了现在。过去的兴趣也成为

了今日的挑战。政治也让社会学家面临风险。特别是在 2011 年 10 月 23 日之后社会运动变得更不可掌握。在地的罢工、静坐、冲突等等蔓延全国，中西部的小城镇也有革命运动。地方领袖也积极组织群众抗议，透过社会网络集合大众。专家学者完全无法预测，社运也不断更新目标，像是环境、族群、地区、性别等等。社运研究必须每日更新。

> 动荡年代的社会学

我们一共有 3 个社会系，60 个社会学家。这些人可分成 3 群。第一是出版社会动荡相关书籍的学者，为数不多，可能只有 4 或 5 个。差不多也有相同数目的人出版文章。多数不发表动乱的文章，因为“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很难被分析，变化太快也混乱。”在革命之前，有超过 2 或 3 个的社会学家处理社运的题材。而后革命时代的第一年，第二类的社会学家写作了一些关于自身经验的东西。每周甚至每日的报纸都是他们发表的场所，纪录所见

>>

所闻。许多致力于找出运动者是谁。有些人则是用 blog 或 Facebook 纪录。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媒体对社会学有兴趣。可是后来就没了。至于传播知识这回事，突尼西亚的社会学家正经历新的媒体关系，有的媒体需要这些学者去讨论政治社会的议题。有些学院人士已经背成编辑者，在一些知识性的杂志工作，有些人则在非学术的研究中心任职。这些其实都不再生产学术知识了。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不用太乐观，因为他们的环境并不太好。下一个问题则是：是否这些媒体公司会给予公共社会学一的推广的契机？

有一位突尼西亚社会学家曾说过“我的发表都是来自我的个人努力，别人帮过我。”也有人说：

“我们这些不是顶尖的社会学者没有什么机会。那些活动都是给有头有脸的人参加的。”所以，年轻社会学者面临了很困难的处境：“当一个人必须独自奋斗时，年轻人才就会流失了”。不过我们还是有了新的期刊：“思索今日的突尼西亚社会：人文与社会科学得年轻学者”。这个期刊把法语的写作者找来一起发表，并召开会

议，于 2012 年 7 月举行，和 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e Maghreb Contemporain (IRMC) 合作。除此之外，从独裁垮台之后，25 年来，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给学生参加的会议了。

其中一个被突尼西亚社会学者采用的响应是去到国外期刊发表，以保持能见度。第一个国际的社会学会议，以“阿拉伯革命的社会学”为主题，在 2011 年 3 月于 Sidi Bouzid 举行，这个地方是 Bouazizi 事件的发生地点，他就是那位点火自焚的水果摊贩，此举动也触发了突尼西亚革命。但是这个会议却吸引不到 7 个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其中 1 人还是在 Beirut 居住，一个是阿尔及利亚人，另一人还是从英国来的黎巴嫩人。

其他社会学家试着要去与社会运动建立关系：

“我自己就是个社运分子。我要去用我的立场去阐释社会学视野。”其他的人说：“这并不容易。行动主义在突尼西亚是新的发明，不论执政者或是反对者都不支持。训练、概念、召集等必须同时用民主的方式进行。”这也必须尊重每个团体的内在差异。所以，这个议题旧

更加困难，尤其是当你的武器多过于意志的时候。从 2011-2012 年的学期开始，许多年轻研究者已经显示出了对于社运浓厚的兴趣，特别是硕士生，少数也有博士生。许多研究是利用田野调查，访问、以及其他的方法，研究年轻人的角色、社会媒体、以及参与经验。

> 新的研究机会

研究的大门更加敞开了。过去对于政治干预的迫害，的确箝制了言论的自由。而今这个限制已经没了，受访者也将可以更畅所欲言。研究者也可以利用照片、影像、日记等等当作研究素材。可是，新的理论框加仍待发展。

我们可以说突尼西亚社会学家若要检视这个变迁的社会，仍然面对许多的阻碍，特别是发展出新的理论视野。快速的社会变迁在强人政治倒台后，必须用更科学的方式去研究。问题依旧：社会学家可以掌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吗？■

> 影像社会学

访谈Joyce Sebag和Jean-Pierre Durand

University of Evry, 法国



Joyce Sebag.



Jean-Pierre Durand.

Joyce Sebag 和 Jean-Pierre Durand 是一对影像社会学的夫妻文件，在 University of Evry 的 Center Pierre Naville 任教。之前他们投身于工作社会学，然后 1995 年 Sebag 和 Durand 设立的 Image and Society 的系所。其所训练的硕士与博士接受特别的训练，以社会科学为底，然后制作影片。教学之余，他们也拍摄了 3 部纪录片：Dreams on the Line，关于在加州一家汽车工厂工人的工作处境；Nissan: a History of Management 是关于一间跨国公司的管理；50 Years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Boston 关于美国的 Affirmative Action。由于他们的努力，法国社会学会最近接受了影像社会学成为正式的次领域。Jordanna Matlon 负责这个访谈，他是 Toulouse 的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博士后。

JM: 你所谓的影像与视觉社会的差异为何？

JS: 我想视觉社会学已经存在很久了，比较像是对照片或是影片的分析，而非思考图像的一种方式。而我们想要做的是去找出解释照片和影片的社会学理论。

JM: 什么是影像社会学家的特长？

JS: 当你研究某个东西然后完成之后，你会感到距离很遥远。你会觉得你自外于该对象。所以其中一个用媒体的理由就是研究者永远置身其中。

JM: 影片是这个方法最必要的部份？

>>

JS: 是的, 影片是一种可以用来说明科学并非存在人们之外的一种方法。这包括了人们被研究或是描述的过程。你所说的就是这个。纪录片是一种反思的空间。我们作研究去开创这个空间, 然后用这个方式和人们讨论, 特别是那些不在这个情境下的人, 并且同时创造出某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讨论的空间, 也是纳入多元观点的方式。

我们会看到这些在影像中的人是研究的演员。你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在思考。他们不是客体。

JM: 可以举些例子吗?

JPD: 例如在我们的纪录片 (Dreams on the Line) 里面, 我们不说很多话, 不讨论工人与工会。也不是说没有, 但就是一点点而已。然后有些人说了很多任务会的坏话, 像是工会是给...

JS: 懒惰的人

JPD: 懒惰的人。是, 有个人这样说。然后有个女人说“我是女人所以我不能罢工。”当你写作是, 你可以离开, 因为这那只是一秒钟而已。可是事实上我们运用这个批注去显示为什么以及人们如何接受新的处境, 像是日本的工作规则。然后工会必须去和成员相处, 所以要保持沉默。

JS: 我们看到工作的人们很急也很累, 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沉静和放松的一面。所以这必须去让大家看到他们有多么沉静。不过话说回来同时我们也访谈他们, 说“这是个苦差事, 很苦很苦啊。”这不是 Charlie Chaplin 的电影喔。所有都看起来很安静。于是我们并列了人们感觉的不同, 然后称之为 Dreams on the Line, 因为每个人都梦想要逃离这里! 这是个对话的开始, 讨论过于简化的真实, 以及过于暴力的简化。

JPD: 像是 Joyce 说的, 这是主体社会学, 但是也是理性的。我有我们的观点。我们预设了我们的主体性, 不过这笔写作还难。没错, 我们在做选择, 我们取景和编辑影像等等。可是他你摄影时, 你不能只是轻易放弃某些不方便的真实。这是个大问题啊! 我写作了 15 本书, 我知道怎么去呈现重点和论证, 可是拍摄影片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因为社会事实就在面前。有些社会学家可以像是魔术师, 但是你不可以, 因为你是影像社会学家。

JM: 你们怎么看待影像社会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JPD: 我相信我们的角色是去揭露被隐藏的社会

生活。因为这样, 我们必须去理性的解释事物, 但是也要被听见, 去吸引人们, 所以要去处理情绪。写作的话, 我想是更难表达我们的情绪。

JS: 例如当我在访谈时, 有一次是位女性关于 affirmative action 的影片。她的回应透露出了他的尊严与控制。这样她可以挑战他些使用暴力的人。我想尊严就是很重要的。

JM: 你认为在影像社会学, 若是用情绪去说服, 这是否有被批评操弄的空间呢? 或者这是另一种理解的方式?

JS: 我想没有一种单一理解的方式。我们的理解不是理性的。理解带有情绪, 并且这是可被理解的。的确, 你有可能了解更多, 可是, 对啊, 你可以在书中操弄, 而且更简单啊。在影片中你与影片的人的关系也在变化。我在作田野时, 有个工人说: 你说你在作研究, 而我们帮你, 可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至对你有利而已。

JM: 像是剥削。

JS: 是啊, 向剥削。但是当你看到人在影片中时, 他们真实存在。或许你可以向他们解释, 或许这也是另外一种剥削。可是只少我们说“你存在着”。你思考, 你说话。而且可以看到物理的存在与听到说话的声音。而且很重要的是去显示出人们不是阴影, 而是真实的人。他们会思考, 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看到他们的脸。我们不是剥削他们, 把部份的他们放到影片而已。

JM: 那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JPD: 很多人, 包括公众、社会学、学者等无法解读影像的人。在学校, 我们学习怎么读和写字, 可是从来没有学怎么阅读影像。有许多影片专家, 像是影片分析家, 照片分析家, 影评家等等, 但是专业和公众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这是个问题, 原因是公众一包括了很多社会学家一并没有能力阅读影像。我想这恐怕是最大的挑战。

JS: 我想有需要去训练怎么阅读影像。

JPD: 在一张照片里面你有对这张照片的感觉, 但是若你看到照片, 你也要想这张照片是在哪拍的, 以及什么在照片以外。

JS: 当你秀出一张影像时, 同时也没秀出很多东西。

JPD: 对, 这里有个框架,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框架之外的。

JS: 对什么学家来说，这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同时都在看什么被看到，以及什么没被看到。

JPD: 对，所谓的脉络。

JS: 脉络，没错，就是说什么框架之外，什么被隐藏起来了，以及什么在你面前。

JPD: 很多的人只看框架里面的东西，但是如此就不可能了解一个更大的社会，也就是更大的图像。

JM: 你已经谈论如何了解影像的训练了。我的想象是这或许和影像社会学更有关。可以说一下你在 University of Evry 的硕士课程是如何开始的吗？

JPD: University of Evry 在早期 90 年代成立，是四所 Paris 郊区大学的其中一所。我是工业社会学家。我们有个很聪明的校长，推崇创新。Joyce 找到他并且谈有关电影社会学得构想，但校长说：“我没有预算，若你能找到预算，我当然愿意支持。”

JS: Jean-Pierre 找到资金。他是汽车产业的研究者，而产业的管理阶层愿意提供财务支持给学校。他们赞助我们，于是我们买了第一部摄影机。此外，在学校训练的方面，第一年，我说：

“OK，若你要学到东西，要毕业，那么什么都要学。”所以他们必须学声音、摄影、导演、剪辑、等每一样技巧，此外还要修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影像历史、图像分析等的课。这些一年内要学完。然后我们要求教育部认证这项训练，最后 1997 年设立了影像和社会的硕士学位。这个学位要求学生拍电影当作论文，并且独立完成。

JPD: 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提供多重训练的学位：技巧、影像、社会科学等等。

JM: 你说的唯一是指法国还是全世界？

JS: 我不知道全世界的情况！但是我想在法国若不是唯一，也是第一个。

JPD: 现在我们有 20 个硕士生和 7 个博士生！

JM: 现在你们已经训练出那么多专业人士了，你认为从学术的角度而言，你们失去了影像社会学家吗？或是你认为他们还是会认为自己是影像社会学家呢？

JPD: 这完全看他们怎么想。有些人对于社会与政治很有兴趣，有些学生从事社会运动。我们告诉他们社运不必然让你做好的影片，因为你从事社运，有特定的观点，所以你不会愿意去



Sebag 和 Durand 的第二部有关 affirmative action 的电影。正在制作中，这是其中一幕。电影叫做 From Mississippi to Boston: a Family Trajectory。讲述一个奴隶家庭一路奋斗到 Harvard 的故事。

从其他角度看事情。因为这样，我会用大约 6 个月的时间去告诉他他必须改变心态，去用更大的角度看事情。这些人一旦了解了这点，他们会成为非常好的影像生产者，因为他们对社会有信念。

JM: 那你想那些博士会对教学有兴趣吗？

JPD: 有些人会成为纪录片导演，是非常高层次的导演。其他会当老师，进入学术。但他们知道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是很困难的，因为首先必须知道影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的一个分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正朝向那个方向。或许只有 3 或 4 所大学接受影像社会学，位子很少，这是个问题。我们才刚开始呢！■